

创学视域下的 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研究

赵四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创学视域下的 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研究

赵四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学视域下的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研究/赵四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61 - 6899 - 8

I. ①创… II. ①赵… III. ①文化理论—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369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欣闻赵四学博士《创学视域下的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研究》（以下简称《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出版，这是哲学中首个书名冠有“创学”的著作，蕴意深刻，谨致祝贺！

“创学”是什么学？其内涵和特点是什么？先从最近一次学术会议谈起。2015年7月，笔者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十九届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海内外一百五十多位学界同仁共聚一堂，广泛交流中国哲学领域学术成果。在会下，笔者与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创办人、80岁的成中英教授多次交流，一致认为会上发表的论文虽多，但大多是对古哲先贤思想的解读或时下应用，面向未来的新理论探索非常少，令人慨叹。成教授近年倡导“中国哲学再创造”，认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不但必须，而且自然可行，是人类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①。不过，受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学界应和者不多。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哲学长期由“经学范式”主宰，而理论变革却被边缘化？这一创生力疲弱的现象，值得深思。

20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林毓生曾提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不过，林先生泛指“中国传统”，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因此中国传统转化的核心是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如果我们不拘泥“创造性转化”用语的表面，而追求其内在实质，则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家在传承基础上的新哲学探索，都属于广义的“创造性转化”。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等都是对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宝贵

^① 成中英：《中国哲学需要“再创造”》，《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5日。

探索。

20 世纪下半叶，台港及海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有新的发展，形成新儒家三期的递进。海外学者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既是新哲学探索，也是新哲学的方法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大陆中国哲学新理论探索长期停顿，80 年代后，探索有所活跃，如张世英的“整体性”哲学、李泽厚的“情本论”哲学、张立文的“和合学”、董光璧的“当代新道家”等。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研究仍以人物、学派、观点的论证为重点，新理论建构处于学术主流视野之外，更未能对社会大众产生应有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发展，中国哲学与文化更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再创造，推动新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是学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改革深化和精神重建的迫切需求。《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一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版的。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造论”（以下简称“综创论”）。

早在 1935 年，张岱年即提出了“综创论”，中心思想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贡献，融合为一，而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①。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张岱年进一步通过“天人五论”全面论述了他的“综创论”新哲学体系要点。80 年代，方克立等学者在组织宏大的评论“新儒家”学术运动中，鲜明支持并深入研究了“综创论”思想，对推动这一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刘鄂培等一批学者也为综创理论建设做出了各自贡献。以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创论”，成为我国新文化理论探索中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

笔者自 1990 年起有幸在张岱年老师指导下从事“综创论”研究，1995 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以“创造”为核心的新哲学理论框架，1999 年出版“古道今梦”系列专著（由《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三卷组成，约 60 万字）。张岱年、蒙培元、刘大椿三位学者分别为三卷写序。张岱年在序中评价拙作时指出：

在认真评价儒、道、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周易大传》生生日新为源，转化形成以“创”为主导的中华新精神，并将“创”作为核心

^① 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国闻周报》1935 年 3 月 18 日。

范畴，融入中华文化内核。认为“创”是现代精神的标志，较“仁”更能体现人的本质，由此，提出了将“仁学”等传统思想转化提升为“创学”的新观点。^①

这是张老师对“创学”内涵精练而权威的概括。21世纪以来，笔者及有关教师、研究生等组成的学术团队，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等为平台，在“创学”理论探索和大众实践普及方面默默耕耘、不懈努力，取得了一批有独到探索意义的成果。《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就是这批成果之一，该书的第六章对“创学”来源和含义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读。

笔者觉得，“创学”的特色可简要概括为四点：

(1) 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创学”研究尝试突破中国传统哲学泛道德化的局限，在中西、文理、古今、凡圣四大会通的跨学科背景下拓展哲学新境。

(2) “道”的古今通贯。“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最高追求，“创学”继承这一思想，通过对道的“本体与境界”合一追求，实现古今之道的贯通。

(3) 从“仁学”到“创学”的转化。继承张岱年等中国哲学家“天人合一”的广义创造观，与现代西方创造学说结合，建设中西会通的“创学”理论。

(4) 落脚在大众实践亲证。贯彻先哲“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把“创造之道”落实到百姓大众生活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造就21世纪新人。

以上四点联系起来就是跨学科—承道统一启新命—同修行，具体来说，“创学”是以“跨学科”拓新为视野，“道统”传承为主线，“创造”觉悟为追求，“大众”亲证为落脚点形成的以“创造之道”为核心的中西会通新哲学。

2010年11月21日，由笔者发起，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安徽省图书馆协办的“中华文化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各界人士400多人参加，新华社等多家媒体作了报道。中华文化大学以“大学之道”的修行为宗旨，“承道统、启新命、同修行”为定位，坚持开放性和公益

^① 张岱年：“序”，载刘仲林《新精神》，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性,推动大学学子与社会大众同学共修,成为“创学”的大众实践基地。接着,陆续创办“中华文化大学网”(http://zhwhdx.ustc.edu.cn)、骨干学员学习班、在线网络视频课堂等,通过中华文化大学的基础教程《中华文化精修入门》《中西会通创学入门》,形成较为完整而多样化的“创学”教学传播实践体系。2014年,由笔者主讲的“中华文化精髓修养”课入选由教育部评选的“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四学博士不仅参与了创学理论研究而且积极参加大众化实践活动,在“中华文化大学”的普及教学、志愿者服务中都活跃着四学的身影,《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就是在这一环境下产生的。这种新理论与大众实践密切结合的探索并不多见,应是该书首个特点。再者,该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综创论”的思想来源、历史传承、近代发展,不仅包括“综创论”的思想,也包括了马哲、科哲、儒家、道家、易家以及士林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综创论”兼容并包的特点。另外,该书对“创学”的提出、具体内涵、思想特点进行了细致阐述,很好地呈现出创学“跨学科—承道统一启新命—同修行”的特点。综上所述,该书对中国新哲学文化探索,特别是“创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当然,由于中国哲学新理论探索长期被边缘化,“创学”理论研究如“逆水行舟”,加之“创造”本身的复杂性,中西会通的跨学科性,“创学”的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说,《创学新文化理论研究》在理论深入性、原创性上有待加强,相信随着四学博士这部处女作出版,会有更加精深的“创学”研究著述问世。开放的“创学”欢迎各界人士加入探索!

创造是人的最高本性,是真善美的结晶,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一切进步改革的根本是人的创造力解放,市场经济从“外学”层面触及了问题的一半,而东西文化会通将从“内学”触及另一半。

冲破千年经学范式桎梏,中国哲学再创造、中华文化启新命,前进!加油!

刘仲林

2015年8月22日于月树书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2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3
一 国内研究现状.....	3
二 中国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路线与创新点.....	6
一 研究方法.....	6
二 研究路线.....	7
三 研究创新点.....	7
第二章 “综合创新”论思想之源头活水	8
第一节 创之觉醒：罔珠之拾.....	8
一 从“李约瑟难题”谈起	8
二 对钱学森之间的反思	14
三 中国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	16
第二节 儒家创生哲学思想	19
一 生之谓性：生命乃宇宙的最高本体	19
二 生之谓仁：仁德是生命的本质	22
三 生仁互通：生命秩序与道德追求合一	24
第三节 道家生生哲学：忘生以达生的无为思想	25
一 生生之不已的厚生哲学	25
二 道法自然的人生态度	27

三 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追求	28
第四节 易传创生哲学：生生之谓《易》	30
一 生生之谓《易》	30
二 生而又生谓之易	31
三 生生不已，重在人能	32
第三章 “综合创新”论思想之时代传承	34
第一节 熊十力生命哲学对《易传》、佛学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	34
一 体用不二	34
二 明天化，重人能	36
三 熊十力生命哲学的地位	39
第二节 方东美融中西一体的“生生创进”哲学	39
一 方东美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吸收	40
二 以《周易》“生命始于创生，止于至善”为根基的生生 哲学观	40
三 方东美以创造为核心的“普遍生命”本体论	42
第三节 以中西（士林）哲学融合会通的罗光生命哲学	43
一 生命哲学之形上学：儒家“生生”与士林哲学“存有” 的会通与融合	45
二 动的生命观：生命本体“存有”与“变易”的会通与 超越	46
三 由天主的创造力向人的创生力飞跃	48
四 罗光生命哲学对中国新哲学建设的启发	50
第四节 梁漱溟的生生哲学思想	53
一 意欲决定一切的宇宙观	54
二 直觉到理性的认识论	56
三 从理性走向“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58
四 梁漱溟生命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60
第四章 “综合创新”论思想之现实基础	62
第一节 “综合创新”论思想是中国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 结果	62

一	西力东侵为“综合创新”论思想创造了外部环境	62
二	西学东渐是“综合创新”论思想产生的外部推力	63
三	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65
第二节	中国文化觉醒是“综合创新”论思想产生的 内在动力	66
一	中国文化由一元向多元化发展是“综合创新”论思想 产生的现实基础	67
二	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与困境	68
三	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的新挑战与新的历史使命	73
第三节	“科玄之争”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发	75
一	玄学派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76
二	科学派思想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79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科玄之争”的态度	80
四	关于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反思	81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	82
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	82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土壤	84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	85
第五节	中国文化理论建设的模式之争	88
一	时代精英对文化变迁的反思	88
二	中国文化理论建设模式的探索	90
三	近代文化理论建设的现实选择	93
四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本质上是综合创新的过程	94
第五章	“综合创新”论思想之推陈出新	96
第一节	以物为本的本体论	96
一	“以物为本”对传统哲学“唯气论”的传承与超越	99
二	“以物为本”对现代新儒家本体论的批判吸收	101
三	“以物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融合	103
四	知“本”达“至”	106
第二节	生生大化的宇宙观	107
一	生生两一	107

二	一本多级	109
三	大化三级	110
第三节	“兼和”之创生追求	111
一	“天人本至”：人生之自然	111
二	“兼和”：人生之当然	113
三	充生以达理：自然向当然飞跃之途径	115
第四节	创生之境界追求：动的天人合一	117
一	传统天人相分	117
二	静的天人合一：心性境界之追求	120
三	动的天人合一：实践能动至当然	121
四	动静天人合一：内修与外炼的统一	122
第五节	“综合创新”论方法启迪：体验、解析、会通	123
一	体验、解析、会通三法相结合	123
二	体验、解析、会通对创建新理论的启示	127
三	张岱年文化建设“三任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	128
第六章	“综合创新”论思想之时代发展	136
第一节	“综合创新”论思想之接着讲	136
一	由“中、西、马”三流合一到“马魂、 中体、西用”	136
二	兼和：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的新范式	137
第二节	创学是对新文化理论的基本构建	138
一	创学的基本内涵	138
二	创学的主要根基：传统“道统”思想	141
三	创学的灵魂：现代“创造”精神	142
第三节	创学的理论具体建构	153
一	古道今梦：中华精神第一义探索	153
二	中西会通中国创造学：成物与成己的统一	155
三	交叉科学：创学时代的新学科	157
第四节	新文化建设的接受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中华民族	158
一	弘扬民族主体精神	158
二	人民大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	160

第五节 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普及——以中华文化大学堂 为例	161
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中华文化普及工作的启示	162
二 文化新命与大众觉悟	164
三 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165
四 学子与平民同学共修	166
五 文化大众化关键是人生亲证	168
总结与展望	172
参考文献	174
致 谢	18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问题的提出

本课题的研究，缘于笔者长期在学习和教学工作中的诸多困惑。第一，居于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何难以被大众广泛理解、接受。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主要学习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与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进入高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深刻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未能在当今广大学生和普通民众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存在的缺陷还是广大学生和民众的不理解？抑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接“地气”，与现实脱节，与中国本土文化脱节？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真正实现大众化，在人民心目中扎根、开花、结果，其具体途径是什么呢？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还能胜任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吗？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正统，法家、道家、佛家等多元并存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虽历经浩劫，但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博大宽宏的胸襟容纳和吸收了各种外来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再次复兴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吗？第三，改革开放的中国，西方文化不断涌入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审美观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该以何种文化作为我们价值评判的标准和行为处世的准则，越发成为困扰中国社会大

众的较为突出的问题。第四,全球化浪潮中,中西实力的差距主要在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其根源在于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缩小这种差距呢?中国怎样才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的关系?面对这些诸多困惑,笔者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跟随导师刘仲林先生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创造学。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明白刘仲林老师正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思想则使我眼前一亮,多年的困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因此,本课题就是在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指导下,在刘仲林“创学”视角下,探寻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

二 研究的目的是意义

本书从“创学”的视角,分析了“综合创新”论思想产生的文化起源、时代传承,以及“综合创新”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内涵、发展演变。全书通过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分析指出,经过近百年的文化论争,中国文化建设已由过去的文化论争阶段进入到文化建设时期,经过广大学者长期不懈努力,中国文化新理论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其中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建立了新的范式。本书通过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大量潜在的“创造”思想,其中《周易》的“生生日新”是中国“创造”思想的起源,也是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的源头。《周易》“生生之谓易”思想中,张岱年解读“生”即创造,这一思想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以此为核心,张岱年先生建立了“天人五论”中国哲学新体系。在张岱年先生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为中国文化的新理论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刘仲林等在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基础上,结合西方创造学,进行深入的“创学”理论建构和大众实践探索,笔者作为“创学”探索性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本书主要对“综合创新”论思想起源、时代传承、产生的现实基础、具体内涵、理论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使“综合创新”论思想和“创学”以完整、系统、全面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另外,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是“中、西、马”并存与竞争的现实,文化多元化必将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而价值观多元化必然导致主体文化缺失与价值观困惑,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时代所需。中国文化建

设离不开人民大众,因此中国文化建设不仅有理论创新的时代重任,而且还肩负起文化普及的革命工作。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参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和人文学院支持下,刘仲林教授发起的“中华文化大学(堂)”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中华文化大学(堂)”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方向,以中华文化大师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指导,以中华文化的整体为视野,以学子和大众的亲证实践为检验标准,以“传承”与“创新”融会贯通为手段,以实现“叩启真的心窗,探寻善的家园;追求美的境界,觉悟创的人生”为目的,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笔者是“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实践参与者,总结其成功经验,反思其不足,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大众化工作不断深入,这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自1840年以来,中国忧国忧民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自身文化存在的不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将这种反思推向高潮。随着“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学者用了近百年时间论争,终于明确了中国文化传播与创新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自20世纪以来,一些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们纷纷尝试建设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中,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贺麟的心学体系,以及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哲学体系最为显著。然而,从“综合创新”论的视角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建设,国内学者主要有张岱年、方克立、刘鄂培、刘仲林、李维武、李存山、钱耕森、陈卫平、王东、王中江、张允熠、洪晓楠、周德丰、干松春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文化建设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老一辈学者开拓的道路上,一批年轻学者也加入到“综合创新”论的研究队伍中,为“综合创新”论思想的研究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如刘静芳、简红江、金丽、裴小敏、王永伟等学者。总之,在广大学者的不断努力下,“综合创新”论思想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范学德先生1989年出版的《综合与

创造——论张岱年哲学思想》，这是较早研究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思想的著作。程宜山先生 1990 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是第一部系统阐明“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文化学专著，该书详尽介绍了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的起源、发展、基本内容和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程宜山先生 1995 年又出版了《潜龙之梦——中国哲学复兴的展望》，该书全面拓展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以促进中国新哲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克立先生 1997 年出版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在该书中，方克立先生深入分析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导原则、产生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并进一步揭示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思想不仅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而且对“综合创新”论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文化由“中、西、马”三流合一向“马魂、中体、西用”进一步深化。方克立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又符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刘仲林先生 1999 年出版了《古道今梦——中华精神第一义探索》一书，该书包括“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三卷，该丛书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创”为核心，以“中西会通、古今会通、科技与人文会通、文化精英与大众学子会通”为目标，以“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指导，对构建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进行了探索。2000 年，刘仲林先生再推新著《中国文化综合与创新》一书，刘仲林在该书中指出，张岱年先生在 70 年前提出的中国新哲学理论包含“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合科学”四个要素对中国新哲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东先生 2002 年出版的《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一书，对中国多元文化发展进行了研究。同年，刘鄂培先生出版了《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该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思想，而且探寻了“综合创新”论思想的思想渊源、发展脉络。近几年，一些年轻的博士、硕士也投入到“综合创新”论的研究中，写出了一些有质量的论文或文章。除了相关著作、期刊研究成果外，不少学者也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对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思想进行了研究，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陈卫平先生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同样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诠释的三条路向，其中胡适代表了科学主义路向，冯友兰代表了人文主义路向，而张岱年则综合了科学与人文的路向的对立，以试图实现二者的融合与超越。程宜山先生认为，张岱年先生

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兼综融会、自成一家的唯物论新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与当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先生的体系鼎足而立，而且为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宝贵借鉴。

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较多地在学理上对“综合创新”论思想进行了探讨，尚缺少中国新理论的具体构建。刘仲林先生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创造学结合的背景，以“创造”思想为核心，以中西会通、科技与人文、大众与学子、古代与现代四大会通为方向，着力建设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哲学新文化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建设不仅体现在理论的具体构建方面，也体现在文化的大众化普及方面。张岱年在新文化建构中明确提出新文化的社会实践问题，即新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但由于受历史环境限制，没有付诸实施。多数学者注重较多的是新理论建设，而对新文化大众化普及工作关注不够。以刘仲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识到新文化走进大众生活的重要实践意义，并作出初步尝试，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执着的信念。“中华文化大学（堂）”追求大众与精英学子互通的实践探索无疑为中国文化的大众普及工作开拓了一条新路。而本书所研究的，就是系统总结“综合创新”论思想的起源、历史传承、产生背景、具体内涵、发展演变、反思与展望，这方面的工作是极具开拓性探索的。

二 中国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研究现状

除了大陆外，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也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建设。主要是当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刘述先等，以罗光为代表的台湾辅仁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致力于新士林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反思中国传统哲学，并致力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形成中国新哲学。其中，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员有吴经熊、罗光、赵博雅、邬昆如、项退结、傅佩荣等，其中罗光的生命哲学尤为突出。海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如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陈荣捷等，他们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融入整个世界体系之中。因此，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儒家精神与现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与现代管理结合起来，将儒学伦理精神发扬光大，并发挥出其光芒。所以，必须反省“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极端倾向，重估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那些有价值的思想，以求得儒学的复兴。